

国土空间规划论丛

# 国土空间规划经典

顾朝林 武廷海 刘宛 主编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土空间规划论丛

# 国土空间规划经典

顾朝林 武廷海 刘宛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土空间规划经典/顾朝林,武廷海,刘宛主编.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9

(国土空间规划论丛)

ISBN 978-7-100-17029-1

I. ①国… II. ①顾…②武…③刘… III. ①国土规划—研究—  
中国 IV. ①F1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4052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国土空间规划经典**

顾朝林 武廷海 刘 宛 主编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7029-1

---

2019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98.00元

# 编者前言

国土规划，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概念，1980年代时称之为国土整治与规划。然而，今天的国土空间规划却显得非常重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201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有机融合”。2018年5月，习近平在北京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一次重申了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的重视，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同时明确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推动美丽中国建设。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中发〔2018〕44号），进一步确立了新时代规划的地位和作用，要以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建立以国家发展规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为支撑，由国家、省、市县各级规划共同组成，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

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提供更多优质生

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国土空间规划就是对不同层级、全覆盖的国土空间（如城镇建设用地、生态区、农业区等）的管控细则，国土空间规划“既不是城乡规划，也不是土地利用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首先要保护生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其次要坚持绿色发展。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最后，要实现人地和谐。以人为本，全面摸清并分析国土空间本底条件，划定三类（城镇、农业、生态）空间和三条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聚焦空间开发强度管控和主要控制线落地，达到重量、重存量、重特色、重生态的国土空间规划理念转型。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本质上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匹配，以国土空间为载体，合理利用和保护国土空间格局，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区域统筹、综合治理，完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机制，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为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编制和实施，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编辑部在10年杂志文章的基础上，精心缀辑《国土空间规划论丛》前沿和经典两册，供规划工作者参考，并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关心、批评和指正。

顾朝林 武廷海 刘 宛

2019年1月30日

# 目 录

- 1 公地的悲剧 加勒特·哈丁
- 12 城市一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 宋家泰
- 24 迎接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的时代 吴良镛
- 35 健全地域空间规划体系 胡序威
- 39 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 联合国人居署
- 50 地方主导的新增长模式 藤田昌久
- 55 人口增长、工业革命与城市转型 艾伦·凯利 杰弗里·威廉姆森
- 75 知识工作者 赵娟娟
- 89 增长、创新、规模标度及城市节奏  
路易斯·M. A. 贝当古 何赛·洛沃 德克·黑尔宾 等
- 103 中国城市土地开发的空间性 邓永成
- 112 空间、空间的生产和空间政治经济学 亨利·列斐伏尔
- 129 聚落遗产与文化景观的系统保护 张 杰 邓翔宇
- 146 聚落结构模型的历史发展 G. 阿尔伯斯
- 169 中国城市地区的识别：街区尺度的探索 龙 瀛 沈 尧 金晓斌
- 192 巨型城市区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研究 张晓明 汪 淳
- 214 通过城市规划建构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希尔达·布兰科 玛丽娜·阿尔贝蒂
- 236 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规划研究框架 谭纵波 顾朝林 刘志林 等
- 256 我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过程 张 兵
- 268 我国空间规划的过程和趋势 顾朝林

# 公地的悲剧

加勒特·哈丁

顾江译

##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Garrett HARD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Translated by GU Jia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city, Hubei 430079, China)

威斯纳和约克 (Wiesner and York, 1964) 在一篇关于核战争前景的发人深省的文章结尾时说：“军备竞赛的双方都将……面对持续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持续减弱的国家安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判断认为这样的困局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大国继续在科学技术领域找寻解决办法，结果只会使局势更加恶化。”

希望各位不要仅仅关注该文章的主题（核武世界的国家安全），而是要留意作者的结论，即“困局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然而，大部分专业和半通俗科学期刊的评论，都假设所讨论的问题是“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的。技术性解决办法可以定义为“只要改进自然科学的技术，无须或只是稍微改变人的道德观或价值观即可解决问题”。

我们现在一般都欢迎技术性的解决办法（以前并非如此），因为预言往往失准，要有莫大勇气才能断言“没有可预期的技术性解决办法”。威斯纳和约克表现出勇气，在《科学》期刊发表文章，坚持问题不能在自然科学找到解决办法。他们谨慎地为声明加上以下的批注：“深思之下，我们的专业意见是……。”本文所关注的，不是他们是否正确，而是一个重要的观点：有一类关乎人的问题可以称为“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

其实很容易来证明这类问题是普遍的，我们可以回想“井字棋游戏”，想一想：“我如何赢井字棋游戏？”假设（依照博弈论的惯例）我的对手是个中能手，大家都知道我不可能赢。换句话说，问题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要赢，我只能把“赢”的意义根本改掉。我可以打对方的头，可以作弊。每一种我要“赢”的方法，都是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游戏的本质。（当然，我也可以公开放弃——不

---

### 作者简介

加勒特·哈丁，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

顾江，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玩。大多数成年人都这样。)

“没有技术性解决办法的问题”当然也有其他的案例。我认为——大家惯常认知的“人口(过多)问题”就是这样的命题。公平地说,大多数人都试图寻找一种方式,要找出方法避免人口过多的恶因,但同时又不愿放弃他们正在享受的特权。他们以为海洋养殖或发明小麦新品种会解决人口增加所带来的粮食需求增长问题——这是基于技术解决的视角。而我,在这篇文章中会尝试证明他们并不能找到解决办法。人口问题正如要赢井字棋游戏,不能技术性解决。

## 1 人口应该增长到什么程度?

如马尔萨斯(Malthus)所言,人口正自然趋向于以“几何级数”增加,或是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函数增加。在一个有限的世界,这意味着人均占有量必然减少。那么,我们的世界是否有限?

一个中肯的抗辩说法:世界是有限的,或是我们不知道世界不是无限的。但是,从实际角度来看,基于以后几代人可见的科技水平可以明白,如果我们不是实时假设地球上人类可利用的世界是有限的,人类的悲惨境遇将大大增加。“太空”不是逃生门(Hardin, 1959)。

有限的世界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因此到了最后,人口增长必然是零。(零增长的永恒大幅度上下波动是微不足道的变动,在此不讨论。)当条件符合,人类的情况会是怎样(Fremlin, 1964)?明确地说,边沁(Bentham)的目标——“最大多数的最多利益”能否实现?

不可能——理由有二,单是一个已足够。第一个理由是理论性的。数学上,两个(或两个以上)函数是不可能同时最大化。诺伊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7)已经清楚地说明,其中的绝对原理是起码可以追溯到达朗贝尔(D'Alembert)的偏微分方程式。第二个理由是直接源于生物事实。任何生物要生存,必须有一个能源来源(例如食物)。该能源用于两个目的:维生和工作。人要维持生命,每天需要1600千卡路里(维生卡路里)。维生以外所做的一切可以定义为工作,由额外摄取的“工作卡路里”支持。工作卡路里不是只用于我们日常谈到的工作,所有享乐形式都需要:游泳、赛车、音乐、吟诗。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人口最大化,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工作卡路里趋近于零。那将意味着没有可口美食,没有度假,没有运动,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我以为无须争议或实证,大家都同意人口最大化不会使利益最大化。基于以上的原因,边沁的目标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在达成以上的结论时使用了通常的假设,获得能源就是问题所在。核能的出现导致一些人质疑这种假设。但是,即使有无穷能源,人口增长依然带来不可逃避的问题。正如弗莱姆林(J. H. Fremlin)机智表达的那样,取得能源的难题,被能源浪费的困扰取而代之。分析的算术符号正负倒转;而最终边沁的目标不能达到。

因此,最合适的人口数量肯定是要小于人口的极限数量。定义最合适的困难很大;依我所知,没有人曾郑重处理这问题。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和稳定的解决方案一定会需要不止一代人的辛勤分析工作



和反复劝说。

我们期望每个人都能获得最大好处，但什么是“好”？基于各人情况的不同，某人的理解可能是荒原，另一人则可能是大众的滑雪小屋，某人喜好的是河口盛产水鸭，供猎人射击，另一人也许又是工厂用地。我们一般说比较各人的心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喜好”是难以衡量的，而难以衡量就意味着难以比较。

理论上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只需要一套判断的标准和权重的体系，这些“不可衡量”就可以变为“可衡量”。比如，大自然的标准就是生存。何等物种较“好”呢？小而可掩藏，或是大而强壮？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会比较我们所不能比较的，这取决于大自然为众多变量的价值自然加权。

人必须模仿这种自然过程来进行研究，毫无疑问，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这样去做了。未来的工作难题将是要做出一个可接受的加权理论。这个难题因协同效应、非线性变化和对未来的预测而变得困难，但（原则上）我们不是不可能解决。

至今，是否有任何文化群体解决了这一实际问题，即使是直觉层面？一个简单事实证明还没有：现今世界没有发达区域在一段时期内人口数量达致零增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可以很快达到直觉上认同的最佳数量之后增长率保持为零。

当然，增长率为正数，可以作为人口数量在最佳点之下的证据。但是，以任何理性标准来看，今天世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其生活质量和状态（一般而言）是最悲惨的。这种联系（无须是一成不变的）令人对所谓“正数增长率表示人口还没有达到最佳点”的乐观假定感到怀疑。

迈向适度的人口数量，我们要驱逐亚当·斯密的实践人口学理论，才可以取得寸进。《国富论》（1776年）广为宣扬“无形之手”，这概念即是个人“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Smith, 1937）。亚当·斯密也不敢断言这是一成不变的真理，甚至他的追随者也没有。但他带动的思想主导着社会思潮，干扰着基于理性分析的积极性行动。这种趋势就是假定个人决定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的最佳决定。如果这假定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假设人类会合理控制自身的繁殖，从而产生最佳的人口数量。如果这假定是错误的，我们则必须重新检视种种个人自由，看看哪些是站不住脚的。

## 2 公地自由的悲剧

反驳“无形之手”在调控人口数量方面的观点，最先见诸1833年一位数学爱好者威廉·福斯特·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撰写的一本鲜为人知的小册子（Lloyd, 1833），可称之为“公地的悲剧”（Whitehead, 1948）。“悲剧”一词借用自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的话说：“戏剧悲剧的本质不是不快乐，而是蕴藏于万事万物无情运作的严肃性。”他续后又说：“命运之无可避免，只能以人

生不如意事引证，只有这样戏剧才可表现逃避是徒然的。”

公地的悲剧正是如此揭幕的。想象一下，当草原对大众开放而没有限制，每个牧民都会在公地饲养尽可能多的牛只。也许在几个世纪内，这样的政策都是令人满意的，因为频繁部族战争、偷猎和疾病会把人与动物的数目保持在远低于土地承载能力之下。然而最终，人们长久渴望的社会稳定的一天到来，却也到了清算的时刻（人和动物的数目超过了土地能承载的范围），公地的内在逻辑将无情地产生悲剧。

作为理性人，每个牧民都会试图追求取得最大收益。或明或暗地，有意无意地，牧民会问自己：“牛群多添一头，对我有什么效益？”这效应有积极的部分，也有消极的部分。

(1) 多一头动物的函数是正成分。出售牛只的收益全归牧民，所以正效益接近+1。

(2) 负数部分是多一头动物造成的过度放牧的函数。因为过度放牧的后果由全体牧民承担，所以任何一位牧民做出决定，负效益也只是-1的小部分。

把这些效益成分相加，理性的牧民总结出他只有一个理性选择：多养一头牛，再多养一头……但这也将是分享公地的每一位牧民的结论。悲剧因此而起，每个人都会被这种趋势束缚，驱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牛只——而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大利益，而整体则走向毁灭的终点——公地自由带来整体毁灭。

有人会认为这是陈腔滥调。但愿它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几千年前就学会了，但物竞天择（自然选择）经常还是被心理否认，纵使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而受损，个人还是会因为取得私利而否认真相（Hardin, 1964）。教育可以抗衡做错事的自然倾向，但必须一代一代地持续并保持更新。

几年前，在马萨诸塞州莱明斯特市有一件小事足以说明知识的逐渐消失。圣诞节购物期间，市中心的停车计时器用胶袋遮掩，上有告示：“圣诞节后重开。免费停车由市长和市议会提供”。换句话说，针对本来已是短缺的、需求增加的停车空间，城市之父再建立公地制度。[嘲笑一句，我们怀疑他们这倒退的行为是得（选票）大于失。]

大概是同样的道理，可能是自农业的大规模开发或房地产的私有化以来，我们就已明白公地的逻辑。但了解这个逻辑的大多数都是特殊个案，没有得到充分的推广。即使到了现在，牧牛人在西方地区租赁国有土地进行放牧只不过证明他们模棱两可的认知；他们向联邦机关施压，要求增加牛只数目，结果因为过度放牧导致侵蚀和杂草丛生；全球海洋依然因为公地哲理残存而深受其害，海洋国家依然高喊着“四海自由”的口号，他们声言相信“海洋有无穷资源”，令多种鱼类和鲸鱼几乎灭绝（McVay, 1966）。

国家公园是公地悲剧的另一个例子。现今是对外开放，没有限制。公园范围是有限的——只有一个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 National Park）——但游客增长没有限制，这导致公园访客的享乐价值逐渐减弱。很简单，我们要尽快改变把公园当作公地的情况，否则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价值。

我们可以做什么？有几个方案。可以出售为私人产业；可以保留为公共财产，但分配进入的权利。这种分配可以是以财富为基础，用拍卖方式；亦可以根据一些彼此同意的标准来定优劣，可以是

彩票，或是先到先得，甚或是由抽签决定。我同意以上提到的方式都令人反感，但我们必须选择，或是默许我们称为国家公园的公地被毁。

### 3 污染

公地悲剧的反面是污染问题，不是从公地拿走，而是放入——往水中排放污水或化学、放射性和热力废物；往空气中排放有害气体；在视线所及树立令人分神和不悦目的广告。效益的计算和前述一样。理性人发觉他向公地排放废物的成本，是少于排放前进行废物清洁的成本。由于每个人都是如此，只要我们这些独立、自由的投机者继续自作妄为，大家都将受缚于“自家弄脏自家”的情况。

食物篮子的公地悲剧，因为私营农场或类似的经营模式而避免了。但我们周围的空气和水不能轻易地分隔，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防止污水流动引发公地悲剧：强制的法律或税务措施，使污染者在排放前处理污染物的成本比不处理低。我们解决这问题的进展非常缓慢。停止我们耗尽地球的直接资源的私产概念，实际上助长了污染。小河岸边工厂的主人——他认为自己的私产应该被一直伸延到小河的中央，而不明白弄脏流经门前的河水不是他的自然权利。法律永远赶不上时代，需要修修补补来适应这“公地”的新意识。

污染问题是人口急速增长的后果。在偏远的未开发地区生活的居民如何弃置废物并没有那么重要。老人以前常说：“水流十里，自我净化。”当他们是小孩时，这神话可能近乎真理，因为人口较少。但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大自然的化学和生物循环负荷越来越重，我们亟须对（公共的水、空气资源的）产权进行重新定义。

### 4 如何为节制立法？

如果我们将污染情况视为人口密度提升所连带产生的问题，会引申出一项不是普遍了解的道德原则：体制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对行为道德的定义也不同（Fletcher, 1966）。如把公地用作污水池，在地区内开发程度较低时并不会危及大众，因为人口较少；而在大都市这样做就不能忍受。150年前，平原居民杀死野牛，只割下牛舌头做晚餐，其他部位全部丢掉。这种行为在当年可能不被认为是浪费，但是在如今，只余下几千头野牛，同样的行为会令人感到震惊。

顺带一提，一个行为是否道德不能从照片来确定，除非知道某人的行为对周边的全部影响。我们是不能知道某人杀象或放火烧草是否危及他人的。中国古人有言：“百闻不如一见”，但可能要用无数的佐证来解读照片。生态学者和改革者一般试图用相片来说服他人。但这是不可靠的，相片不能反映行为的本质及其对周边的影响，我们需要语言来进行理性的表达。

以前整理道德准则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道德是和体系有紧密关系的。传统的道德指令形式：“汝不得……”没有顾及特别环境。我们社会的法律依循古老道德的模式，所以不适用于复杂的、拥

挤的、多变的世界。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倾向是扩大和完善行政法令，因为我们是不能列出何时在自家后院烧垃圾是安全的，何时是不安全的；或是在没有排放控制的条文下，开大排量高污染的汽车是否是合理的……这些全部情况，所以我们会把制定法令的权力授权给各相关部门。有一个古老的理由令我们担心——谁来监管监管者？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说过，我们必须有“法治的政府，不是人治”。如果我们使用行政法令来衡量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准则，行政部门的权力就太大了，容易变得腐败、贪污，进而产生人治的政府，而不是法治。

立法禁止容易（但执法不一定如是）；但我们如何为“节制”立法？用行政法来仲裁可以达到目的。如果我们纠结于因为对“谁来执法”的争执而不支持利用行政法，就是没必要地限制了可行的办法。我们应当正视这可能会有一些隐含的危机，需要监管者大公无私，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目前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找出方法，为执法者和监管者进行合理授权。

## 5 自由生育是不能容忍的

在一个由“丛林法则”管治的世界——如果曾经有这样的世界——一个家庭有多少子女不会受公共关注。如果父母生育过多子女，存活的后裔只会少，不会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照顾所有的子女。戴维·拉克（David Lack）和其他人发现这样的负面回馈控制了鸟类的族群繁殖（Lack, 1954）。但人类不是鸟类，超码在过去几千年都不是如此。

在每个人类家庭都仅依赖本身的资源的情况下，如果子女因为父母缺乏远见而生育过多导致饥饿死亡，我们的家庭系统就会受到过度生育所引起的“惩罚”，如收入低下、缺衣少食，这似乎是不涉及他人的公共利益的。但是，我们的社会致力于建设一个福利国家（Girvetz, 1950），单独家庭的苦难被社会所均摊了，这就会导致在社会福利领域因为人口增加而引发的“公地的悲剧”。

在一个福利国家，我们如何应付因家庭、宗教、种族或阶层（或是任何可以识别和有凝聚力的社群）等原因所导致的过度生育的情况（Hardin, 1963）？很多夫妇都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享受公共资源的平等权利，但是无止境地生育会把我们的整个世界“锁止”在一个悲惨的境地。

不幸的，这正是联合国的行动方针。1967年下半年，约30个国家同意“人权宣言描述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和基本单位。因此家庭规模的任何选择和决定，无可置疑应由家庭自身做出，不可听命于他人”（Thant, 1968）。

要明确否定这项权利的合法性是痛苦的，正如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居民纠结女巫是否存在，这会使人感到不安。现时，自由主义阵营视批评联合国为禁忌，感觉联合国是“我们最后、最好的希望”，我们不应吹毛求疵，不要被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玩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话：“朋友（出于好意或怜悯）所隐瞒的真相，是敌人最灵活的武器。”如果我们深爱真理，就必须公开否定人权宣言的合法性，虽然这是联合国所推广的。我国应当联同金斯利·戴维斯（Davis, 1967），试图改变“计划生育——世界人口组织”的同样错误。

## 6 良心使人自我净化

有人认为长期控制人类生育是违背良知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Charles Galton Darwin）在他祖父的伟大著作百年纪念发言时，就指出这点。达尔文式的论点简单直接。

人各不同。面对限制生育的呼吁，无疑有些人的反应比较积极。而那些有更多孩子的人则会使他们在下一代中的比例较之那些有着更敏感良心的人大得多，并且这种差距会随着一代又一代得到强化。

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如是说：“人类可能要经历几百世代才进化出这种影响生殖的特性；如确实如此，大自然会报复的。避孕人会灭绝，被生殖人品种取代”（Tax, 1960）。

这个论点是假设良知和生儿育女的欲望（无所谓是哪一种）是遗传的——所谓遗传是就最一般性的正式意思而言。用洛特卡（A. J. Lotka）的定义来说：无论这态度是经生殖细胞或体外传播，结果都是一样。（如果否定后者的可能性，也否定前者，那么教育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在人口问题的背景下提出这个论点的，但它同样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事例，如社会通过让人良心发现来呼吁利用公共资源的人为了集体的利益而限制自己的行为。做出这样的呼吁也意味着建立起一套机制，用以消除竞赛中出现的良知。

## 7 良知的原发性作用

虽然长期呼吁人们良心发现的弊端会导致社会的谴责；但这亦有短期的负面影响。当我们要求滥用公地的人们“因良知之名”而停止行动，我们会对他说什么？他会听到什么？——不只是当时，也是夜深人静、半睡半醒时，他不但会想起我们所使用的词句，还有我们无意识中暗示给他的讯息。有意无意之间，他迟早体会到他接收到两种讯息，而彼此是矛盾的：①（有意的讯息）“如果你不按我们说的做，我们会公开谴责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②（言外之意的讯息）“如果你听话而行，我们会暗中责怪你头脑简单，骂几句就站在一旁，容许我们这些人继续滥用公地”。

每个人都陷于贝特森（Bateson）称之为“进退两难的处境”。他和同僚已经似乎合理地解释了进退两难是精神分裂症的重要成因（Bateson et al., 1956）。进退两难并不一定总是这样有破坏性的，但人若陷于其中，会危及精神健康。尼采如是说：“良心不安，是一种疾病。”

对于那些希望自己能超出法律的限制去控制他人的人来说，能够对别人的良心施法术总是个诱人的想法，位于最上层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历史上有哪一位统治者不是成功地号召起劳动者联盟让他们自己克制对工资的需求，或者使企业团结起来以能自愿地指导价格为荣？记忆所及，没有。每一次的用词遣字都着意在令不合作者有犯罪感。

几百年来，似乎内疚感都被认同为是文明生命中有价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成分。在这个后弗洛伊德的世界，我们却怀疑这一点。

保罗·古德曼（Goodman, 1968）从现代观点来看：“内疚感从来没有带来利益，无论是智力、政策或热情。内疚者只关注自己，不会留意犯错的事物，而且甚至有意义的是，内疚的人关注他们的焦虑，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们不需要是专业心理学家才能看出焦虑的后果。西方社会刚从两百年的欲望年代走出来；那个时代部分是由禁制性法律所维系，但可能更为见效的是通过产生焦虑的教育机制维系着。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在《焦虑的产生》（*The Anxiety Makers*）描述过，单说的并不好（Comfort, 1967）。

因为取证困难，我们甚至可能需要承认有时从某些观点来看，焦虑的后果是可取的。进一步的问题是，作为政策，我们应否鼓励使用一项可能会导致（如非故意的情况）心理疾病的技术？这些日子中，我们时常听到提及父母的责任，这两个相连的词语经常被一些专注于控制生育的组织频繁提及。有人组织庞大的宣传，向全国（或是全世界）的生育者灌输责任感。但什么是良知的意义？当我们引用“责任”而没有相对的约束力，我们是否在吓唬一个享有公地资源的人去做出有违其本身利益的行为？“责任”是物质利益的言语伪装，最终目的是不劳而获。

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上“责任”这样的词汇，最好是用上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的定义。这位哲学家说：“责任是社会分工的产物”（Frankel, 1955）。留意弗兰克尔提出社会责任——不是宣传。

## 8 达成共识的相互制约

产生责任的社会分工，是建立制约的分工。让我们思考一下银行劫案。抢劫银行的歹徒是把银行当作是公地。我们如何防止这种行为呢？当然不是用语言来唤起他的责任感来试图管制他的行为，只是依随弗兰克尔的指导——用宣传来坚持银行不是公地；我们寻求有限制的分工，确保银行不会成为公地。这样一来我们侵犯了潜在劫匪的自由，我们不会否认或后悔。

抢劫银行的道德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公认完全禁止这种活动。我们情愿说“你不得抢劫银行”，没有例外。但制约也可能产生自律，税务就是一项好的制约措施。为了控制市中心的购物者自觉地适度使用车位，我们引进了投币式计算器，并用交通罚款处理长时间停车。我们无须禁止市民泊车，他要停多久就多久；我们只需让他泊车越久，费用越高。我们不是提出禁令，而是提供一些视情况不同的自由抉择。广告业者可能称之为“说服”，而我更喜欢用“制约”。

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制约”是肮脏的，但不会永远如此。正如其他肮脏的词汇，暴露于光线之下，一次又一次理直气壮地说出来，我们就会接受它。对许多人来说，制约的含意是隐居幕后、不负责任的官僚们的随意决定，但这是多虑了。我所认同的制约是有相互性的，由大多数受影响

的人们的共识决定。

彼此同意制约，并不是说我们需要享受制约，或是假装享受。谁会享受纳税？我们全都为纳税发牢骚。但我们接受强制性税务，因为认识到自愿性纳税只会是没有良知的人（通过逃税）得益。我们开创和支持（尽管会抱怨）纳税以及其他强制性措施来摆脱以公地为荣的心态。

用来替换公地的方案不必是十全十美的，只要比现在更好就行。在财产和其他实质物品的保障下，我们的新方案是使社会事业机构私有化并承认其有合法继承的权力。这体系是否完全公正？作为曾受遗传学教育的生物学者，我持否定见解。对我来说，如果个人承继要有差别的话，法定继承权应该和生物遗传完全关联——那些在遗传角度更适合作为的监护人应该合法地继承更多财产。“虎父无犬子”的说法，隐含于我们的法定继承法律，但经常因基因重组而被嘲弄。笨蛋可以继承百万家财，信托基金可以完整保存全部财产。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私有产权法律制度，连同继承权，是不公正的——但我们只能将就，因为我们相信现在没有人能发明一个更好的体制。公地的替代物是什么？这似乎是个不敢去思考的问题，但是总而言之不公正总比全面毁灭来得好。

改革与保持现况的战争总是被双重标准影响而左右。当有改革措施提出时，往往因为反对者找到其中的瑕疵而流产。正如金斯利·戴维斯指出的：现况的支持者时常暗示，只要不是人人都统一，改革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暗示违反史实（Roslansky, 1966）。我几乎可以断言，自发拒绝改革建议是基于两项不自觉的假定：①现况是十全十美；或②假设改革的方案不是十全十美的就没有必要改，我们应当不采取行动，等待十全十美的建议。

但是我们不可以全然不动。几千年来，我们所做的就是采取行动。行动可能会产生邪恶。一旦我们知道维持现状意味着行动，我们就可以比较已经发现的优劣势，并和改革建议的优劣势进行比较，以尽我们所能克服经验欠缺的不利条件。基于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做出理性的决定，摒弃那些只有完美体制才能允许的不切实际的设想。

## 9 对必需品的认同

或许对人口问题最简单的概括是这样的：公地如果对所有人都公正，就必须建立在低人口密度的条件下。随着人口的增加，公地会因各种因素而难以为继。

首先，我们需要放弃在公地采集食物，把农地圈围起来，草原、猎区和渔区列为禁区。这些限制在全世界范围内并不都是绝对的。

其次，我们认为将公地作为废物处置地也是不行的。西方世界普遍接受限制家庭污水排放；我们仍在尽力阻止由汽车、工厂、农药、化肥和核电装置对公地的污染。

我们对公地悲剧的认识还停留在非常幼稚的粗浅认识阶段。我们对于公众媒体电波的传播几乎没有限制。消费者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持续被杂乱无章的音乐猛烈袭击。我们的政府付出亿万美元创造超音速运输，只为能减少3个小时把旅客快速地从海岸一端送至另一端，而导致有5万人受到音波

骚扰。无数的广告弄脏了电台和电视的大气电波，还影响游客们的视野。立法禁止为个人愉悦而利用公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否因为我们的清教徒传统视寻乐为罪恶，视痛苦（即广告污染）为美德？

对公地的任何限制，都会侵犯一些人的个人自由。以前，这种侵犯大家都能接受，因为同时代的人不会抱怨其受到的损失。而今，类似的侵犯我们要激烈反对，“权利”和“自由”的诉求不绝于耳。但“自由”是什么意思？当人们彼此同意立法禁止抢劫，人们会享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少。纠结于共享公地逻辑的人们，无拘无束的结果只会带来全面毁灭。一旦人们意识到彼此制约的益处，他们会变得主动帮助他人实现目标。我相信黑格尔说过的：“自由是对必要性的了解。”

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节育的必要性。没有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可以从人口过多的忧愁中拯救我们。生育自由会毁灭一切。为了避免做出困难的决定，我们必须对有良知和负责任的父母大加宣传，这种情况必须制止，因为仅对少部分有良知的人宣传会导致在未来全部良知都消失，短期而言焦虑将大大增加。

我们如果要保护和支​​持其他更宝贵的自由，唯一的办法是放弃生育自由，而且要快。“自由是对必要性的了解”——教育的作用是向大家披露放弃生育自由的必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终结类似的公地悲剧。

## 参考文献

- [1] Bateson, G., Jackson, D. D., Haley, J. et al. 1956. *Behavioral Sciences*, No. 1.
- [2] Comfort, A. 1967. *The Anxiety Makers*. London: Nelson.
- [3] Davis, K. 1967. *Science*, No. 158.
- [4] Fletcher, J. 1966. *Situation Ethic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 [5] Frankel, C. 1955. *The Case for Modern Man*. New York: Harper.
- [6] Fremlin, J. H. 1964. *New Science*, No. 415.
- [7] Girvetz, H. 1950. *From Wealth to Welfar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Goodman, P. 1968.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10, No. 8.
- [9] Hardin, G. 1959. *Journal of Heredity*, No. 50.
- [10] Hardin, G. 1963. *Perspective in Biology and Medicine*, No. 6.
- [11] Hardin, G. (ed.) 1964. *Population, Evolution and Birth Control*. San Francisco: Freeman.
- [12] Lack, D. 1954. *The Natural Regulation of Animal Numb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13] Lloyd, W. F. 1833. *Two Lectures on the Checks to Population*.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4] McVay, S. 1966. *Science American*, No. 8.
- [15] Roslansky, J. D. 1966. *Genetics and the Future of M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16] Smith, A. 1937.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 [17] Tax, S. (ed.) 1960. *Evolution after Darw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8] Thant, U. 1968.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News*, No. 168.
- [19] Von Hoernor, S. 1962. *Science*. No. 137.
- [20] Von Neumann, J., Morgenstern, O. 1947.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1] Whitehead, A. N. 1948.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Mentor.
- [22] Wiesner, J. B., York, H. F. 1964.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21, No. 4.

(本文原载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9~210页)